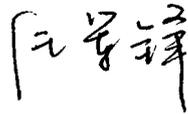


「全贏—全輸博弈」與中國 政治的變遷與改革

——傅士卓專訪



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科學教授，波士頓大學跨學科東亞研究項目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1980年，傅士卓從芝加哥大學中國政治問題專家鄒謙教授門下畢業，其博士論文後來以《民國時期的政黨、國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會組織與政治》(*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1985) 為題出版。傅士卓是英語學界近些年來相當活躍的研究中國政治的代表學者，其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政治學、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1983至1987年和1989至1991年，傅士卓先後在美國對外信息處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擔任分析師、高級分析師。

傅士卓的《中國改革的困境：政治衝突與經濟爭辯》(*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1994) 一書，深入細緻地分析了經濟改革背後中共上層權力關係格局：鄧小平與陳雲、趙紫陽與胡耀邦、趙紫陽與李鵬之間圍繞經濟政策主導權而展開的權力角逐，揭示了中國經濟改革背後的一齣齣政治活劇。在《「天安門事件」以降的中國：轉型的政治學》(*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2001) 一書中，傅士卓發現，「八九事件」表現為要求民主化、西方取向的知識份子與壓制性的政黨—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然而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社會圍繞改革及其

* 是次專訪由復旦大學王濤博士現場協助錄音，復旦大學范文菁女士將錄音稿整理成英文文字稿。在此，特向他們付出的心力表達誠摯之謝意。當然，這裏要特別感謝傅士卓教授為此次專訪所投入的精力和耐心，並在此對他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做的貢獻表達由衷的敬意。

後果展開的爭辯及思想分野卻遠為錯綜複雜：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城鄉與地區之間的失衡、腐敗，以及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自主性等一系列議題，直接折射為知識界的觀念分歧和激烈論爭，新自由主義、後現代／新左派、民族主義、新國家主義以及新保守派等，知識界和公共輿論呈現出空前的雜多性。到199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與1990年代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反差，這時的中國政府往往表現出與西方接軌的渴望，而學生和知識份子則對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憤怒不已，他們反對中國政府為獲得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支持而接受美國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該書與《中國改革的困境》彼此呼應，成為當代英語學界分析中國改革前二十年的經典作品。

《當代中國的上層政治》(*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1)是傅士卓1990年代撰寫的數篇重要論文的結集。長期以來，中國上層政治權力鬥爭的基本遊戲規則是「全贏—全輸博弈」(win all, lose all)，這正是中國社會長期陷入治亂循環的癥結所在。延承業師鄒讜教授這一觀察中國政治的重要視角，傅士卓關注改革的深入能否幫助中共走出這一權力鬥爭的怪圈？他結合中國二十年改革的具體案例，對其中的可能性和障礙做了極為精彩的分析。在整個當代中國研究學界紛紛將目光轉向基層政治研究的背景下，這部著作將目光集中在上層政治，認為上層政治的品相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未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按：正文□為任軍鋒提問，◆為傅士卓教授的回答。

在1940年代後期和1950年代早期，美國政治科學中能夠用來解釋中國的東西可謂少之又少。鄒讜借用摩根索的現實政治視野，旨在解釋美、中關係破產的根源。與主流政治科學相比，摩根索關於歷史和權力的分析對中國更有解釋力。

一 「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政治及其教訓

□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中接受這次專訪。您的著作經常提及您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的日子，特別是鄒讜教授在學術上對您的深刻影響^①。能否與我們的讀者分享一下您與鄒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對中國研究的貢獻？

◆ 你知道，鄒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的，這一話題在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早期廣受關注。也就是說，鄒先生的博士論文並未直接涉及中國，而是關於政治科學的。但是，在我看來，力圖從政治科學和一般所稱的跨地域型解釋(portable explanations)角度來認識中國，鄒先生可以說是最早的學者之一，當然也是進行這一嘗試的首位華裔學者。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認，隨着鄒先生將關注點轉向中國，他對政治科學的解釋力始終心生疑竇，因為他了解中國，在那裏長大，通過父親鄒魯以及個人的社交圈子，他曾是中國政治的局中之人。

可以肯定的是，在1940年代後期和1950年代早期，美國政治科學中能夠用來解釋中國的東西可謂少之又少。在業師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的幫助下，鄒先生得以返回芝加哥大學任教。也是在摩根索的提議下，鄒先生開始撰寫《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1963) 一書。在該書中，鄒先生借用摩根索的現實政治視野 (Realpolitik)，旨在解釋美、中關係破產的根源。與主流政治科學相比，摩根索關於歷史和權力的分析對中國更有解釋力。

從1971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開始，我有幸結識鄒先生。當時隨着文革的爆發，鄒先生將注意力轉向中國國內政治。1968年，鄒先生與何炳棣合編《中國之危機》(China in Crisis)，開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當時經常對自己的學生說，應當將某某理論用於分析中國，但肯定需要對之做某些修正 (大意)！如何對理論進行修正？當時我作為研究生，常為此很撓頭。鄒先生致力於把握西方理論，但他同時對中國保持着某種理智直觀 (intuitive understanding)，這就使他經常在兩個世界之間穿梭。如果你留意鄒先生畢生所致力的工作，可以發現，他非常注重尋找適當的術語和概念以解釋中國的現實。

例如，鄒先生用諸如「無暇顧及地帶」(zone of indifference) 這樣的概念解釋文革後國家從社會中的退出。他並沒有從西方學界經常運用的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社會視角去看問題。在他看來，國家從「無暇顧及地帶」退出，並不意味着國家放棄了其隨時隨興重新介入的可能。我知道有許多中國學者沿用鄒先生提出的「全能主義」(totalism) 概念。如果鄒先生在天有知，我希望和他談及這一點。首先，在我看來，鄒先生是在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完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但我想問題還不僅於此，因為我們要知道，在中國，國家宣稱自己有權包辦一切，從理論上講，社會的任何部分都在國家的觸及範圍之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聯邦體制卻有一條邊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的權力範圍，法律體系在「公」與「私」之間劃清了界限。然而，全能主義卻排斥這一邊界，這使我想劉再復與林崗合著的《傳統與中國人》一書中提出的「泛道德主義」這一概念^②。鄒先生運用「贏者全贏、輸者全輸」這一概念，雖然他借助政治科學方法解釋問題，但同時試圖提出一套全新的解釋中國的語彙。因此，在我看來，鄒先生始終認為，某種政治科學若要被拿來解釋中國，便必須經過概念再造 (re-conceptualized)。在我研究中國的過程中，我始終銘記鄒先生的這一教誨。

我了解到，一些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正在討論所謂「本土化」。我想鄒先生肯定會對這一做法非常抵觸——雖然他對中國發展自己的社會科學非常同情，但在他看來，某種「中國的」政治科學的出現只有在中國學者充分吸收而不是拒斥西方社會科學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鄒先生會探索某種共生性，即西方社會科學能夠為研究中國提供靈感的領域，以及中國研究能夠豐富西方社會科學的領域。但令我憂慮的是，至少有一些討論「本土化」的學者在真正了解西方社會科學之前就將其拒之門外。因此，探索如何將西方社會科學用於分析中

鄒謙運用「贏者全贏、輸者全輸」這一概念，雖然他借助政治科學方法解釋問題，但同時試圖提出一套全新的解釋中國的語彙。他始終認為，某種政治科學若要被拿來解釋中國，便必須經過概念再造。



傅士卓教授

1980年代在中國開創的進行公開探討和政治探索的諸多渠道，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業已消失。在當前的中國政治建制中，即便是相當溫和的自由式政治主張，都難以找到表達的空間。

國，我們必須格外小心。我認為有一點鄒先生會欣然同意，那就是需要仔細界定概念。諸如「和諧社會」只是一個不錯的政治口號，但它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科學概念。我們必須對自己所要傳達的意思格外謹慎。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你不能界定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中國特色」，那還有甚麼好說的呢？你剩下的只有含糊其詞、模稜兩可。整個社會科學的主旨在於力圖使概念更加清晰準確，而不是使其愈加模糊。

□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1989年的悲劇性事件無疑是一個「分水嶺」，這一標誌性事件恰好是您兩部代表作品（《中國改革的困境》和《「天安門事件」以降的中國》）的結尾和開端。二十年後的今天，這一事件在三十年改革歷程中有着怎樣的重要意義？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贏者全贏、輸者全輸」、「堅決鬥爭、決不妥協」、「不屈不撓、絕不退讓」等依然貫穿在中國政治的日常運轉之中？您認為當前的中共領導人能夠從這一悲劇中吸取怎樣的教訓？

◆ 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這都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有些中國朋友或許會說，無論1989年發生了甚麼，至少中國在過去二十年裏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因而可能有人會說，中國所付出的代價還是值得的。在我看來，中國學界在未來許多年裏將會就「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展開討論。但我認為有一點必須考慮：那就是1980年代在中國開創的進行公開探討和政治探索的諸多渠道，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業已消失。或許可以這麼說，至少在當前的中國政治建

制中，即便是相當溫和的自由式政治主張，都難以找到表達的空間。隨着社會衝突的加劇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我看來，問題就在這裏。「天安門事件」之後，圍繞某些可能的發展路徑的辯論遭到壓制，某些方案成為可接受的，而另一些卻不被接受，我認為這正是不斷困擾中國的問題所在。

2010年，據說中國大約發生了18萬起群體性事件，平均每天500起。根據我讀到的中國官方報導，其中80至90%的群體性事件是由地方幹部濫用職權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頻發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地方幹部行為控制力的減弱。目前中國需要新的組織政治權力、監督地方幹部的的方法。無論是更加開放的媒體、某種形式的選舉體制、增強人大的作用，等等，諸如此類的舉措應當在更加廣闊的視野中予以考慮和對待。據我了解，有人正在討論這樣的改革，但似乎尚未提出能夠為政治建制接受的方案。我懷疑這是否「天安門事件」的遺產在作祟。

在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政權從鄧小平一代轉移到江澤民一代，再轉移到胡錦濤一代，到2012年新一代也將接掌政權。不管存在怎樣的歧，中共高層內部似乎都能夠彼此妥協，因此許多人開始討論中國政治更程度的制度化。我對此持懷疑態度。我不否認中國政治的制度化取得了不少進步。但據我所知，中共十六大規定的退休年齡為七十歲，這樣喬石就得下，但江澤民也是七十歲，卻沒有下，理由是他臨危授命。五年後，退休年齡一下子降到六十八歲，七上八下，對吧？而李瑞環恰好六十八歲，那麼他就得下。這樣我們就要問：你規定的退休年齡究竟是六十八歲還是七十歲，抑或是視乎你的政治對手的退休年齡？究竟是制度化還是玩弄政治的制度化？

依我看，中國需要繼續往前走，明確規則，使每個人遵守規則，這將是非常關鍵的一步。2012年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因為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將屆退休年齡。因此，中國將面臨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領導層權力換屆，這將是對中共高層腦海中所謂的「規則」的一次大考驗。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吧。依我看，中國政治體制正在進入一個新的變化多端 (change and flux) 的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政治將是怎樣一種制度化，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固有的「贏者全贏、輸者全輸」依然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一部分。

在我看來，中共領導人實際上從「天安門事件」中吸取了不少教訓，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是，他們很不情願看到任何形式的抗議活動在中國滋生，因此能夠做出及時反應，處理抗議的苗頭，我認為這無可厚非。但這同時卻導致了某些非常笨拙的做法。另外，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體制按照自身的意願，其反應速度明顯提高。雖然政府不喜歡公眾抗議，但至少能夠做出反應，處理某些問題。例如這幾年醫療改革方面取得了大幅度進展。這樣，我們發現一套令人費解的體制：即便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有組織的抗議，卻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對公眾的不滿做出相當積極的回應。自從我那本集子（《當代中國的上層政治》）出版以來，我認為中國的上層政治已經取得了不少進步。

中國需要繼續往前走，明確規則，使每個人遵守規則，這將是非常關鍵的一步。2012年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因為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將屆退休年齡。中國將面臨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領導層權力換屆，這將是對中共高層腦海中所謂的「規則」的一次大考驗。

二 權力鬥爭策略與中國式反腐

□ 正如您指出的，「中國領導人願意且能夠在政治上進行討價還價，但這種討價還價往往表現為臨時舉措，而非政治妥協。由於認定有朝一日可能面臨鬥爭和對抗，權力上層內部進行交易的目的是在於使自己在衝突中立於不敗之地。」^③對於中共政治領導人來說，妥協是策略性的而非實質性的。這一主張本身及其背後的預設似乎並不能使我們對中國政治的制度和政治妥協產生即便是「謹慎的樂觀」^④。在過去十年裏，您能否舉出某些能夠使我們對未來中國政治產生「謹慎樂觀」的跡象？

◆ 我寫那段話的時候正值中共上層內部緊張關係頻發的時期，如今似乎沒有那麼多張力。當時處理政治問題的方法表現為開始讓所有人參與討論和決策，同時為此承擔責任。這樣，面對問題，每個人的意見都得到徵詢，從而做出集體決策。這看上去不錯，但我認為這樣做可能導致最嚴重後果是：決策往往取「最小公分母」。例如，像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可能不發揮領導力，他要建立共識，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會有許多有創造力的決策出台，它意味着中共高層某種程度的墨守成規。中國政府仍然可以做出迅速反應，例如金融危機中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該計劃出台較晚，但一旦得到執行，其推行卻相當迅速。至於推行得是否明智，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共權力高層內部的張力可能導致政治上的停滯不前，這意味着無法做出旨在解決問題的具有創造力的新決策，諸如經濟改革、台灣問題、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2012年的十八大非常重要，我們會從中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所以，中國可能存在墨守成規這樣的問題，不過到目前為止還不是麻痹性的。我所擔心的是，中共權力高層內部的張力可能導致政治上的停滯不前，類似於蘇聯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時期」。這意味着無法做出旨在解決問題的具有創造力的新決策，諸如經濟改革、台灣問題、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假如有任何人反對，而且手握否決權，那對中國政治來說將非常糟糕。我不得不承認，我先前的謹慎樂觀現在變成了謹慎悲觀。因此，我認為2012年的十八大非常重要，我們會從中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 您曾不無說服力地指出，在中國，任何反腐鬥爭都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與消除腐敗本身無關：「在當今的中國，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往往不再被指控為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忠，取而代之的是腐敗指控，其實際功效可以說是一致的，即消滅政治對手，使其他人順從，鞏固自己的權力。」^⑤「指控政治對手(或其追隨者)腐敗，業已成為政治鬥爭的常用武器，而且對多數官員來說，似乎愈來愈奏效。與過去指控政治對手在意識形態方面玩忽這一政治手段相較，這或許是一大進步，然而卻凸顯出中共上層政治關係與以往一樣脆弱。」^⑥既然在中國政治史上，以懲治腐敗之名行消除政治對手之實，這種做法可以說屢見不鮮，那麼，在您看來，中共如何才能走出這一根深蒂固的中國式反腐怪圈？假如中共上層政治關係的脆弱性不發生改變，其長期的政治後果會怎樣？

◆ 我認為中共高層面臨的首要問題在於如何控制強大的既得利益，這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中國並不存在。北京高層手裏掌握着那麼多資金，這使政府很難做出可能傷及某些既得利益的決策。假如政府不做出這樣的決策，那麼我認為中國政治體制將面臨逐步蛻變甚至惡化的危險。它將難以應對任何形式的經濟衰退。過去，中國政治是圍繞權力來運轉的，現在依然是，不過金錢的作用愈加重要。

從政治體制角度看，腐敗問題意味着中國人將變得更加憤世嫉俗。你也知道，有許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領導人（儘管不包括地方領導幹部）擁有相當高的支持率。但依我看，假如上層的腐敗無法得到遏制，中國民眾的憤世情緒將變本加厲，這意味着政府的穩定性將大打折扣，且日益脆弱。埃及最近所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每個人都不再信任政府，突然有一天，一起小事件就引發大規模抗議。我認為這樣的後果對中國沒甚麼好處，但政治體制必須做出更具創造力的反應。他們需要說服中國民眾的是，自己做出的決策是反映人民利益的，而不是某一集團的利益。

中共高層面臨的首要問題在於如何控制強大的既得利益。過去，中國政治是圍繞權力來運轉的，現在依然是，不過金錢的作用愈加重要。政治體制必須做出更具創造力的反應，公共決策需反映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集團的利益。

三 多元社會與政黨—國家

□ 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導致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得不面對自身內在的張力：社會要求多元表達，而政黨—國家卻依然拒斥多元主義。既然在幾乎所有處於轉型階段的政治體制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這種張力可謂司空見慣，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認為，在過去和將來，正是這一張力推動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在當代中國政治中，您認為互聯網正在發揮怎樣的作用？

◆ 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任何到過中國的人都會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多元性。中國社會有着各種各樣不同的利益。中國是一個大國，接近十五億人口，他們當然有着非常不同的利益。你可以為湖南文化或上海文化自豪，你喜歡京劇，他喜歡西洋歌劇，等等，這個社會的人們有着很大差別，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利益主張。

你說得對，中國體制的基本結構依舊，是一套一元化的體制。在政治信仰、意識形態領域，至今沒有一套機制將各種意見整合並服務於政府。實際上，我認為這正是促使政治改革的動力所在，但它還不能有效推進政治改革。恰恰相反，政治體制一直在抵制多元化壓力。不過中國社會的多元化無疑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這裏我不得不提及民族主義問題，因為面對上述問題，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個下策。民族主義是某種一元式的反應 (monotonic response)，它要求所有人

都應當團結在政府周圍。民族主義是一種迴避而非回應多元化社會所引發問題的途徑。我們發現過去十年，民族主義情緒急劇升溫。我認為這是未來中國政治改革面臨的癥結之所在。不過民族主義在中國始終是一把「雙刃劍」。

至於互聯網，總體而言，我認為其作用是積極的。我們知道，通過互聯網和微博，許多惡劣的腐敗行為和問題得以披露。例如揭露政府官員的劣迹，中國政府應當歡迎這種做法。但有時網民言論表現得非常極端。例如，著名的鄧玉嬌案，網民一口咬定鄧玉嬌是出於自保，鄧貴大強姦未遂。而實際情況似乎並不是那樣。但中國政府卻被所謂的「民意」綁架，聲稱：「好啦！我們宣布鄧玉嬌有罪，但讓她免於處罰。」這裏受損害的是法治本身。我們不能以民意為依據進行司法判決。美國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案子，當事人叫安東尼 (Casey Anthony)。我們看了相關報導，認為「她肯定有罪」。然而，陪審團十二位陪審員一致認定，猜測歸猜測，證據不足，無法認定安東尼有罪，這就是司法程序。我們永遠無法確信自己是否正確，但我們必須確保遵守法律程序。這樣做或許會使個別人逍遙法外，但這難道不比使無辜者獲罪更為可取嗎？也許法律程序會有不完善的地方，但遵從程序比不遵從程序更為可取。

中國存在一種有趣且明顯的矛盾。一方面，愈來愈多的知識份子擔任政府顧問；另一方面，知識份子更多地是專家（技術官僚）。隨着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知識在今天變得更加專門化。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已經成為過去。

□ 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中，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構成了其中基本命題之一。正如您指出的，這一關係在1990年代和1980年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現：在1980年代，「體制內知識份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與權力精英之間的各種交際網絡影響中共政策，而到了1990年代，國家與知識份子開始走向分離。知識份子「開始游離於廟堂之外，與1980年代相較，他們對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力減弱」，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知識界，它們的特性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知識份子代表社會良心，這在中國儒家傳統中可謂根深蒂固，但這一傳統角色開始發生明顯變化。」^⑦您的這一觀察似乎與中國知識份子（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新左派）的自我認定相矛盾。能否請您就您自己的這一觀察做進一步闡發？

◆ 在我看來，中國存在一種有趣且明顯的矛盾。一方面，愈來愈多的知識份子擔任政府顧問，例如，你們復旦大學可能有人擔任政府對台政策的顧問，許多知識份子參與政策討論和決策諮詢；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更多地是專家，或許我可以稱之為「技術官僚」(technocrats)。中國舊式知識份子往往是那些無所不知的人。像梁漱溟這樣的真正的儒家知識份子，會與統治者據理力爭，他們體現社會的良心。梁是一位具有很高道德水準的人物，他不是技術官僚。或許在中國比他更了解地方政府的人不勝枚舉，然而正是他站出來公開反對毛，為此，毛看他很不順眼。而如今，在中國不會再找到這樣的知識份子。隨着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知識在今天變得更加專門化。如今已經不可能再見到往昔的知識階層。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因此，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已經成為過去。

在西方也是這樣，我們不再有類似於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不再有洛克(John Locke)或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這些人是特定時代的人物。我們最多也只能期望在各自的領域內掌握一些東西。不過在我看來，在中國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

至於自由派與新左派，雙方之間的爭論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已經有十五年的時間。據我所知，兩派各自內部也存在分歧。兩派究竟在爭甚麼？在我看來，如果撥開所有迷霧，他們爭論的焦點圍繞的應該是中國歷史，尤其是那場導致中國共產黨上台的革命。這場革命究竟是正面的、需要維續和發揚呢？抑或是負面的？或者說過去是正面的，如今其服務的目標業已過時？那些處於自由派陣營的人更多傾向於後一種思路。其他處在左翼的則力圖捍衛革命傳統，認為其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其意義。顯而易見，這一爭論需要中國人自己去解決。但它向我們揭示了歷史在當代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的顯著影響。這使我們又回到了你前面關於多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面臨兩種完全不同的主張，但它們直接涉及到革命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這又回到你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依我看，沒有「天安門事件」，新左派便無由產生。也就是說，「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使這場爭論成為可能。

□ 隨着知識界自主性的提高和中國日益捲入全球化進程，199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出現了空前的多元化和明顯的分裂：「1990年代，新的社會思潮可以說是傳統主義、保守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雜燴。」但您在對中國政治光譜進行系統且仔細分析的基礎上指出，「知識界的觀念分野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公共輿論與其說是多元化，還不如說是碎片化(fragmented)。」^⑧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1990年代知識界的碎片化促進了多元化？多元社會的理想類型是甚麼？

◆ 我們前面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部分觸及到這一問題。正如我們業已談到的，中國知識界呈現出廣泛的觀念分歧，這是好事。但多樣性(diversity)與多元性(pluralism)並非一回事。當爭論一方動輒利用國家權力壓制另一方，那可不是甚麼多元主義。例如，茅于軾最近發表的關於毛澤東的文章^⑨。關於毛，我們都可以有自己的論述和看法，但指控茅蠱惑人心或者賣國求榮，卻與多元主義毫不搭界。力圖借助國家權力壓制對手，這是中國知識界非常糟糕的傳統，在文革中也是慣用技倆。我不知道這種做法如今是否管用，但我希望它不管用。但此種做法屢見不鮮，可謂糟糕透頂！假如你不喜歡茅于軾的主張，自己不妨寫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更好的闡釋！你曾在哈佛大學訪學，你知道我們經常圍繞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爭論，但讓人欣慰的是，爭論者往往能夠彼此尊重對方。由於我們美國知識份子手中不掌握任何權力，所以我們不可能利用國家權力傷害對手。而在中國，這種可能性始終存在。我擔心這是否文革給中國知識界遺留下

由於美國知識份子手中不掌握任何權力，所以不可能利用國家權力傷害對手。而在中國，這種可能性始終存在。我擔心這是否文革給中國知識界遺留下的歪風邪氣。徹底擺脫這一糟糕的傳統，也許還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的歪風邪氣。我個人屬於文革一代，假如我出生在中國，肯定會是紅衛兵。我出生在1949年，和薄熙來屬於同齡人。他曾經做過紅衛兵，我想必也會。我認為文革的遺風在中國依然存在。徹底擺脫這一糟糕的傳統，也許還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 您在一部早期著作中指出，在中國政治史上，「公」與「私」之間的爭執可謂根深蒂固，其中涉及的議題「貫穿於且繼續貫穿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政治當中」，從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直至前些年爭論不休的國有企業轉軌改制，「調和私人利益、客觀知識與公共權威的行使，始終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以貫之的主題」。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業已從毛式社會主義轉變為一種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然而，「官僚資本主義在功能上的優勢在於：它可以在不承認真正獨立的私人協會組織的情況下允許追逐私人利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族主義者所承諾的統合公與私，結果卻導致了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和私人利益的『公共化』。」^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無法區分和整合「公」與「私」，官僚資本主義本身就成了一把「雙刃劍」，它在促成空前速度的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滋長了大規模的權力濫用，引發了社會普遍的不滿情緒，前者在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的同時，後者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中共統治的基石？

儘管「浙江模式」一度獲得成功，但政府最終不是讓其自發成長，而是重新將其納入某種「公」、「私」不分的模式之中。因此，應當撇清「公」、「私」界限並將其納入某種多元模式之中，否則將同時損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

◆ 這個問題非常好，也很有意思。你或許知道，我在浙江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因此我非常喜歡杭州，還有中國其他許多地方。「浙江模式」的基礎在於私營經濟和企業家精神，因此，與中國其他地方相比，該模式集中體現在這兩個方面，而且成長迅速。在浙江，我們至少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政治改革：與其他地方相比，商會在浙江成長格外迅速，儘管依然相當有限。我們看到溫嶺實驗的參與式預算制訂，等等。儘管在政治上缺乏顯著突破，但國家與社會之間某種程度的妥協業已出現。但假如讓我設計中國政治改革，我會在鄒讜先生所說的「無暇顧及地帶」的基礎上，允許國家退出，「好啦，你可以有私營經濟。」國家沒有必要干預企業嘛。但假如你違反法律，當然要受到懲處。本來這為推行依法治國提供了相當不錯的契機，某種形式的公民社會將得到成長，私營經濟會不斷發展，而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宣稱的其在未來二三十年所要達到的目標。

然而事實怎樣？中國當政者的做法卻是：將黨組織安插進私營企業和商業協會。這樣做的結果只能使私營企業和政治體制同時走向腐敗。也就是說，政府不是把「私」與「公」區分開來，而是再次將兩者混淆，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限趨向模糊，從而削弱了法治。因此，當中國人談論「國進民退」，我想到的首先是浙江，這意味著「浙江模式」的發展將受到限制。而且我開始懷疑「浙江模式」本身也難以為繼！因此，恐怕這也是我最近開始謹慎悲觀的原因所在。儘管「浙江模式」一度獲得成功，但政府最終不是讓其自發成長，而是重新將其納入某種「公」、「私」不分的模式之中。因此，應當撇清「公」、「私」界限並將其納入某種多元模式之中，否則將同時損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

最近，中國政府提出了所謂「社會管理」的政治口號。為甚麼我們不討論一下「政府管理」呢？我們一起組成社會，不妨一起探討一下如何管理政府？我這裏只是半開玩笑，但你也知道，為甚麼我們就不能從社會應當管理政府的角度思考問題呢？我的意思是，他們是人民公僕，對吧？這就意味着公眾應當管理政府嘛！

四 三十年改革實踐與中國政治科學

□ 從某種程度上說，三十年改革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然而，似乎過去十年與前二十年有着較大差別：諸如「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這樣的新的政治修辭以及一系列隨之而來的社會改革舉措紛紛出台。作為一位資深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您如何評價中國過去十年的改革實踐？這十年有哪些基本特徵？

◆ 是的，過去這些年一直強調構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諸如此類的政治修辭沒有錯，但我擔心的卻是相關的實際舉措少之又少。如今的中國社會比十年前更加「和諧」了嗎？中國的發展更加「科學」了嗎？城鄉之間的差距縮小了嗎？政治參與擴大了嗎？腐敗得到遏制了嗎？濫用權力的現象減少了嗎？恐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不管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主觀意願如何，無論是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還是採用更加科學的發展模式方面，他們的成績可謂捉襟見肘。為甚麼呢？恐怕過去十年留給我們的教訓在於：既得利益壓倒了控制既得利益的努力。

我們不妨假設胡溫政權真正想擺脫沿海地區的發展模式，給予普通民眾於政治體制中更多的發言權或利益，那麼，現在看來，這些努力並未取得實效。我們看到諸如建立醫療保障體制等方面的新的嘗試，但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仍在加劇。我記得五年前的「十一·五」規劃中，他們就開始討論科學發展和統籌規劃，這是非常重大的議題，消費將會增長，投資主導型經濟開始讓位於消費主導型經濟。但至今一切如故。我認為這是由於中國非常強大的既得利益依然主張維持現有體制。所以，你看「十二·五」規劃幾乎是「十一·五」的翻版。

因此，現在的問題在於：「十二·五」這次能夠推行下去嗎？對此我還沒有答案。例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目標在於使農民受益，也的確給農民帶來了某些好處，但誰獲益最多？地方官員嘛。土地集中，將農民遷入新的居民樓，這使他們的居住環境得到改善，但地方幹部這下可以賣土地了。誰獲益？這是繼續將財富從窮人那裏轉移到富人的腰包。中國根本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想必你我都同意。

□ 在過去三十年裏，政治科學作為中國大學的一門學科引起了愈來愈多的青年學生的興趣。然而，長期以來，中國政治科學的整個語彙系統被阿爾蒙德

過去這些年一直強調構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諸如此類的政治修辭沒有錯，但相關的實際舉措少之又少。如今的中國社會比十年前更加「和諧」了嗎？中國的發展更加「科學」了嗎？恐怕過去十年留給我們的教訓在於：既得利益壓倒了控制既得利益的努力。

(Gabriel A. Almond) 式的比較政治學範式主宰，長期困擾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生的尷尬在於：他們在課堂上所學與中國的政治現實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距離，在試圖運用現代西方政治科學的概念框架解釋中國所發生的深刻的政治和社會變遷時，學習政治學的學生依然感到無能為力。您曾在某個場合指出，政治科學家經常在中國政治面前遭遇尷尬。既然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以權力鬥爭為核心，這就使得現代西方政治科學方法愈來愈無法對之做出有效的解釋和準確測量。我們是否可以認定現代政治科學的諸多理論手段與中國政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是否可以說傳統的政治史分析方法對分析中國政治更加有效？

中國不應當僅僅滿足於引進外來的理論，它應當同時輸出自己的理論。假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夠做一些比較研究，將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能夠探索中國的法團主義與其他類型的法團主義之間的不同點，那也是饒有興味的。

◆ 你這裏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許多政治科學理論都集中在研究民主體制，非常注重數據分析，其中許多議題和方法與中國距離非常遠。或許有點讓人啼笑皆非，政治科學並不擅長於思考權力，也不擅長分析非民主體制。近些年來，對威權體制的研究正在升溫，這是一個好的迹象。但其聚焦的大多是制度，而這對中國不大適用。因此，政治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對於分析中國並不是很管用。當然也不排除某些例外，在社會抗議和抗爭性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 領域，政治科學也有某些有價值的作品，而且它對列寧式體制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成效。就我個人來講，我認為應當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這一區間，我認為政治科學能夠為中國研究提供靈感，但中國研究同樣也可以豐富政治科學。

就這一點來說，應當指出的是，中國不應當僅僅滿足於引進外來的理論，它應當同時輸出自己的理論。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才剛剛起步。在過去，政治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識形態灌輸，我們至今依然能夠發現其歷史影響。例如，某些政治科學文章沿用諸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的術語解釋某些東西，但毫無疑問，這根本不是甚麼解釋，而是政治口號。在解釋諸如地方政治組織方面，我認為中國政治學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研究決定地方政府官員行為的因素有哪些？我發現中國已經有許多關於地方政府的實證研究，但諸如人們為何如此行為這樣的問題卻不大涉及。在我看來，假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夠做一些比較研究，將是非常有意義的。當然，將中國與當代美國比較肯定沒有多大意義。將中國與印度或者與五十年前的意大利比較會怎樣？政治權力在各個地方的運轉模式是否都一樣？我們是否可以從「法團主義」(corporatism) 的角度分析中國政治？這一術語被廣為使用，但如果能夠探索中國的法團主義與其他類型的法團主義之間的不同點，那也是饒有興味的。

在我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是不要削尖腦袋去做所謂的「政策顧問」，而應當將更多的精力用在分析中國政治體制中不同行為主體的行為模式，這正是我敦促我的中國同行們去做的。我們應當關心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而

是如何把問題解釋清楚！這樣，中國才有望產生更好的社會科學，中、西社會科學之間才有可能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這些年來發表了不少相當有份量的成果，而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在成長。政治科學曾經被當成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如今，中國已經出現了許多相當出色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但還遠遠不夠，他們的研究需要更加概念化。

五 中國政治制度化的契機

□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中國政治的非常規性 (informal nature) 或者說關係網：「在官僚機構層面和權力高層，雖然常規制度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必須承認，非常規政治依然主宰着上層體制。」^⑩既然任何政治系統中都存在着常規政治與非常規政治之間的張力，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判定一種體制是常規的，而另一種則是非常規的？它們之間的區分究竟是程度上的還是實質性的？

◆ 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回到前面討論的制度化問題上。任何制度均包括常規要素和非常規要素。凡是制度都包括隨着時間不斷變化的規則，因此，它們不是一成不變的。不過，我們不妨再以政治局退休年齡為例。退休年齡上限究竟是七十歲還是六十八歲，我不管，但應規定一個上限，然後遵照執行。如果你想改變，當然可以，通過一項修正案，一項新的法律，改變就是。因此，我認為中國政府可以想辦法減少非常規因素。我認為，創造新的制度，使它們彼此箝制平衡，中國政治才有望實現更高层次的制度化。

常規制度與非常規制度之間最關鍵的區分在於是否有「第三方實施」(third party enforcement)，也就是說，一旦發生爭議，是否存在某種權威性的中立機構出面解決。通常，這意味着獨立的司法。包括獨立司法在內的法律體制是市場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也是構建穩定的政治體制的關鍵。至少從1997年中共十五大開始，中國就提倡依法治國，但在司法獨立方面進展甚微，這就使依法治國無從談起。

另外一個關鍵的區分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哈佛大學已經過世的政治哲學家史柯拉 (Judith N. Shklar，又譯施克萊) 曾指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劃在哪裏並不重要，但有必要劃出這一邊界。不同的社會往往圍繞這一邊界應當劃在哪裏而爭論不休，但我認為劃出這一界限對於建設一個現代社會至關重要。鄒讜先生曾指出，文革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從社會中開始退出，從而留出某些「無暇顧及地帶」。「無暇顧及地帶」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限，它意味着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重新介入任何領域，這在中國依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例如，以私營企業為基礎的「浙江模式」為中國創造了一個極佳的「天然實驗田」。假如中國真的想依法治國，本來可以讓司法體制監督這些企業的行為。然而，事實

常規制度與非常規制度之間最關鍵的區分在於是否有「第三方實施」，也就是說，一旦發生爭議，是否存在某種權威性的中立機構出面解決。通常，這意味着獨立的司法。至少從中共十五大開始，中國就提倡依法治國，但在司法獨立方面進展甚微。

卻是，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黨組織紛紛進駐私營企業。中國共產黨不是劃清國家與社會的界限，而是極力抹殺兩者之間的界線。

□ 標誌着中共黨內權力鬥爭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應當是：代際權力交接是否趨於穩定。自從鄧小平過世後，似乎中共高層內部已然建立起了一整套遊戲規則：諸如黨內民主，由一人兼任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三職，退休年限，幹部的遴選和培養，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中共高層的遵守，這也成為中共政權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實現和平交接的重要基礎。一旦權力精英在上層確立了遊戲規則，並發現遵守這些規則對他們自己都有利，我們是否可以謹慎預期中國政治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走上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軌道？

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共高層的政治行為在制度化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不過，高層政治如何與重大的公共議題實現互動，至今尚未看到。在政治體制中，必然出現重大的社會議題，可能是環境問題、腐敗醜聞，諸如此類都可能使上層發生分裂。

◆ 我認為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共高層的政治行為在制度化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這是值得肯定的。毛澤東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不過，高層政治如何與重大的公共議題實現互動，我們至今尚未看到。在政治體制中，必然出現重大的社會議題，這些議題可能是環境問題、腐敗醜聞，諸如此類都可能使上層發生分裂。一些人主張採用一種行動方案，而另一些人則主張另一種方案。他們如何解決這些爭執？他們能否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解決分歧？我們都對鄧小平非常尊敬，他應該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政治領導人，這一點毫無疑問。是他選定了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在去世後影響政局的能力遠遠超過了諸葛亮，他為中國帶來了二十年的穩定。現在，讓我們看十八大，未來接班人的培育已經完成。在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鐵腕人物的情況下，新的權力精英必然面臨包括人事問題在內的諸多非常棘手的議題，他們的舉措將從總體上鞏固這一政治體制，還是導致不同部門利益紛紛坐大、各自為政？

據說中國現在唱紅。假如民眾自發組織唱紅歌，作為整個「上山下鄉」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政府宣稱「我們要唱紅」，問題的性質可就完全不一樣啦。一個是自下而上，而另一個則是自上而下。我始終青睞自下而上。近些年來，薄熙來吸引了許多人的眼球，因為至少在改革時代，中國往往傾向於那些毫無個性的政治領導人，其中如朱鎔基和溫家寶這樣個性十足的人物實屬例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往往喜歡那些願意服從集體決策的人，他們都是清一色的藍西裝、紅領帶！薄熙來可不是這樣。所以，中共政治體制如何應對這樣的人物，我們不妨拭目以待。另外有一點使我感興趣的是：薄熙來似乎在為自己競爭職位。在過去，中國的政客從不公開競爭職位，薄熙來是否將為中國政治開啟新的一頁？無論薄熙來最終是否能夠如願以償，我想這種現象還會出現。我認為薄熙來正在為中國政治翻開新的篇章。2012年將是觀察中國政治非常有意思的年份。

最近，王長江教授發表了一篇關於黨內民主的長文^⑩，文章討論的是中國未來的變革之路，文中也談到既得利益的問題。我認為王長江討論的是在黨內

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他是思考如何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有開拓性、富有思想的學者之一。他的某些主張能否實現，我們不妨走着看。我們必須等待非常規政治自己發現甚麼樣的常規政治是可取的，我們期待的是遊戲規則更加透明的一天的來臨。這裏的問題不在於等候少數高層領導做出決策，而是創造新的體制。

從一種制度結構過渡到另一種制度結構非常困難。我認為中國的體制目前需要某些平衡性的力量 (countervailing forces)，否則中國政治只能淪為一小撮領導人的俱樂部。我對其中的某些領導人非常敬重。他們有些人非常優秀、聰明，但假如只不過是個精英俱樂部，那並不能長久。中國這麼大，不能這樣搞。近年在人大代表選舉中出現了獨立參選人。我記得政府發布了一份強硬的聲明，宣稱民眾無權這樣做，但依據憲法，他們當然有權這樣做。這種現象非常有意思。在這一方面，我想中國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寬容。近年來，我們發現許多維權律師遭到逮捕或騷擾，這些人力圖在現有體制內推進法治建設。如果你連這些人也不放過，那麼那些想改變現有體制的人只能是那些想推翻現有體制的人了。如果你傷害中間派，那你肯定在助長極端派。你必須將政治體制適當開放。如果不這樣做，後果將會很嚴重。

從一種制度結構過渡到另一種制度結構非常困難。中國的體制目前需要某些平衡性的力量，否則中國政治只能淪為一小撮領導人的俱樂部。中國政治體制需要更加寬容，適當開放。

註釋

- ① Joseph Fewsmith, introduction to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xi-xxvii.
- ②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基本主題的再反省與再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278。
- ③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10.
- ④ 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p. 3.
- ⑤ Joseph Fewsmith, "China in 2007: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48, issue 1 (2008): 82.
- ⑥⑦⑧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1-32; 103-104; 13, 221.
- ⑨ 參見茅于軾題為〈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博文，2011年，www.xxr0312.com/bbs/viewthread.php?tid=107335。
- ⑩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chaps. 1, 7.
- ⑪ Joseph Fewsmith, "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hina", *Asian Survey* 36, issue 3 (1996): 233;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p. 2.
- ⑫ 王長江：〈加快推進黨內民主〉，《中國改革》，2011年第7期，頁10-22。